

“中国体验”的三个认知要素

余达淮¹ 曲韵畅²

(1. 河海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 江苏南京 210098;
2.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8)

摘 要:对于“中国体验”的相关研究,我们提出方法论上的 3 个认知要素,即决定性要素、描述性要素与评价性要素。具体而言,“中国体验”的相关研究,应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找其决定性要素,在人文关怀中实现其描述性要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完成中国体验的评价性要素;而 3 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最终决定了“中国体验”的研究面貌与研究品质。

关键词:中国体验;价值观;资本;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7)05-0037-05

周晓虹先生在其新作《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以下简称《中国体验》)一书中谈到,“中国体验”是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社会宏观实践层面所对应的一种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心态的概括性总称。“‘中国体验’指的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所经历的同样迅疾的精神嬗变”^[1]。并表明“中国体验”与“中国经验”二者之间实质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所不同的是,“中国体验”是一个较为全新的概念,这里所言的“新”,并不仅仅体现于其对中国人价值观中的新问题进行了探讨,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体验”揭示了在“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中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维度,就是中国人心态、价值观念的变化。在此,我们丝毫不否认,学者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心态已经做出的大量研究,而是想言明,对于中国人价值观的研究,我们往往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既有研究虽然呈现出相当的“学理性”,但却往往对整个社会的“体验感”没有充分的关照。而这种“体验感”对社会学、伦理学的研究是最为显性的,是最直接的研究素材,应该始终将学科的感性化素材与理性化的表达分析统筹起来。基于此,我们认为,所谓的“中国体验”式的研究,是更多地强调从人群的微观心理状态出发,从这些社会表象中,结合社会发展的程度,不断提取伦

理、价值观念的研究问题,并且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探究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问题。

通过此种研究思路,我们对于中国人群社会心态的总体趋势便可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这种社会的快速、甚至可以说剧烈的发展不可能不改变着人群的心态,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的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当然,言明“中国体验”的总趋势,也仅仅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进入“中国体验”内在。从这点来看,《中国体验》一书更像是为我们展开了研究的主题,在这一领域仍然有相当的研究的空间。为此,我们提出一套完整的关于“中国体验”式研究的 3 个认知要素,并选取其对应论域中对人群价值观念最具影响的现实生活为例证,阐述此 3 个认知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以论证此种研究方法建构的科学合理性。

一、“资本的体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找中国体验的决定性要素

“中国体验”的研究,是更多地强调从人群、社会的生活习惯中,逐渐引导出人群价值观念的变化,这可谓是“中国体验”的一种研究范式。在阐释道

收稿日期:2017-04-02
基金项目:江苏省重大招标项目(15ZD001)
作者简介:余达淮(1962—),男,安徽歙县人,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

德现象之时,首要的就是不能脱离相应的经济条件,而是应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展开伦理关系的研究,这事实上是“中国体验”的“决定性要素”的寻找,此类要素往往对人群心理、伦理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历,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来自方方面面,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即社会资本的活动。从资本的占有形式来看,中国社会的资本经历了从单一的公有制独占到公有与私有混合,进而发展为公有资本占重要地位,私有资本占数量的多数的历程。从资本的运动来看,中国社会的资本运动则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下资本运动的“停滞”到市场经济初期资本运动的“复苏”,再到与全球经济接轨下资本运动“活跃”的历程。这其中,中国政府与理论界的艰难探索,自不必多言。而具体到人群心理而言,中国人对于资本的微观感觉与认识,即“资本的体验”产生了巨大、甚至可以说颠覆性的转变。即:从资本的绝对否定到资本历史存在权的肯定,再到对资本认知的多元化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资本无疑是一种恶的代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化特征,与社会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而改革开放以后,事实上资本的活动已经逐渐复苏,并进入社会生活领域。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上的突破是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这一谈话,实质上指明了资本在中国的历史存在权。自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资本为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巨大推动作用被广泛认可。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资本快速发展的背后,既带来了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也在客观上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局面。当今中国人对于“资本的逻辑”虽然没有多少学理化的表达,但是却出现了“富二代”“拼爹”等值得深思的形象表达,事实上,这些表达已经开始逐渐触及其核心内容,即资本积累会使资本收益绝对大于劳动的收益,出现一部分人财富的“爆棚”,并且资本有向权力“寻租”的倾向。人群越发体会到资本对于社会发展的“双重影响”,毫无疑问,中国人对于资本为社会所带来的不平等,有着普遍的怨恨情绪,这使得他们催生了抵制资本的意向,然而,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资本显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在社会中承担重要作用,而且确实已经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若从马克思对资本的论述出发,中国人一方面既体验着马克思所言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马克思所言的“资本文明面”也有深

刻的体验:“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5]。这样,中国人对于资本的感受,实质上进入了德国现象学家马克思·舍勒所言的“怨恨式批评”的现象中。用舍勒自己的话来说,“怨恨表达的形式结构总是相同的:对甲表示肯定、赞赏、颂扬,并非因甲之内在品质,而是意在否定、贬低、谴责乙这一他者,只是没有直说而已”^{[6]38}。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中国人对资本虽有种种不满,却很少再次喊出“消灭资本”之类的激进式话语,但是,对改革开放以前那种绝对平均状态的再次“憧憬”却时常出现。事实上,这并不代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过去那种完全无资本的社会有多少留恋,而是对于由于资本运动所带来的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一种表达方式。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直言,收入不平等是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来自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皮凯蒂从现象上正确地指出导致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原因,是“ $r > g$ ”(即资本的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需要明确的是,皮凯蒂的观点,不仅仅是简单的“现在时”,而是一种“将来时”的论断,皮凯蒂认为,自现代资本产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就始终存在着资本的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博弈,但是,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 $r > g$ ”为主要形式而进行经济活动的。特别是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资本的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趋势越发明显,“新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无尽希望,也带来了大量的不平等”^[7]而这一趋势本身,就蕴含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可以说,当前所处的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类被资本所带来的“不平等”的阴影所笼罩。

当然,皮凯蒂的分析没有涉及所有制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其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但是,皮凯蒂的研究结论却是异常深刻的,皮凯蒂再次明确地将人类的不平等问题指向资本,为我们在当今思考资本提供了新的借鉴。我们在此提出资本的体验以及资本的当代特点,想表达的是“中国体验”的后续研究,始终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只不过资本的运动是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因素之一,它对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对等,收入的差距与不平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如舍勒所言:“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即使撇开个人的品格和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6]13}。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当代中国人的多种“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财富的增长与流动有

关,与收入与分配的失衡有关,而其中资本可谓是幕后的推手之一。这并不意味着采用一种用“资本解释一切”的思路,而是指“中国体验”式的研究,首要前提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正确的认识,明确在当代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体验”的决定性要素是什么,这些决定性因素的多方作用才是塑造出“中国体验”的“群像”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决定性因素往往也是种种“中国体验”转向、消失的根本所在。正如恩格斯所言:“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于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8]。“中国体验”的进一步诠释与发展,也都隐藏在这些决定性因素中,这是“中国体验”式研究的前提,也是其一个根本的维度。

二、“幸福的体验”:在人文关怀中实现中国体验的描述性要素

“中国体验”,从其内涵上来看,是对社会价值观、社会心态的一种研究。如何表达这些体验?我们认为,这就涉及“中国体验”式研究“描述性要素”的理解,这些因素直接决定了“中国体验”式研究,对其内在“体验”的认识与把握是否能够最大可能地“还原”人群的心理面貌。如果说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研究,倾向于使用一些不掺杂个人情感因素的、可度量的客观化的数据与材料,如GDP、GNP、基尼系数等,得出一种较为抽象的结论,那么“中国体验”则倾向于一种用人文关怀式的话语,如信任、情爱、代际关系等,来完成对中国人价值观、心灵层面“体验”的描述,这种人文关怀式的话语往往是不可量化的,但却最能凸显人群的心境。自人类产生以来,如果说哪一种人类的体验最为重要,最为深刻,毫无疑问是人类对于幸福的感知与体验。费尔巴哈在其《幸福论》一文中,谈道:“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因此追求幸福可能把人支配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满足这种追求对于他是唯一最大的幸福,因为人所愿望的和努力追求的任何对象都是使人幸福的某种东西”^[9]。“意志就是对于幸福的追求”费尔巴哈的这一论断,将人类的幸福问题,再次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对于中国人而言,每个人所言的“我很幸福”“我不幸福”其中都包含了大量生活与心理的体验。而在当代中国,普遍存在着“幸福话语”与“幸福失语”并存的局面,“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或许更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幸福失语’的人群”^[10]。我们认为,与“幸福失语”有着密切联系的是另一个中国人的体验,即“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是近几年来大多数中国人心理的一个普遍的体

验,它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自身生活的一个困惑。法国文化学者安德烈·莫罗阿曾言:“在组成幸福境界的许多原素中,应当分辨出有些原素尽可变化而毫不妨碍幸福,反之,有些原素则为保障幸福的存续所必不可少的”^{[11][17]}。而在这其中“时间”就可以理解为一种保障幸福存续的必要因素。在此,我们结合前文“资本的体验”,简要阐述一下资本对幸福的“压制”以及对自由时间^①的“侵占”问题。

在一个市场经济占主导经济地位的国家中,客观上为资本的运动创造了相适应的条件;所谓的资本运动,更为直白的表述就是资本的积累,现代资本自诞生以来,资本就是“为了积累而积累”。而资本积累向来只关注,而且也必须关注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而非使用价值。由于资本运动的存在,“市场中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简单差异,可以演变为一种对立关系,进而加剧为一种绝对的矛盾”^[12]。马克思本人正是从这种绝对的矛盾中,推演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资本力图营造一种“丰饶社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新技术的应用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都会将延展人群的自由的时间。然而资本本身是不会在此停歇片刻的,人群的自由时间,为新的交换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所以资本一定会以新的方式来“侵占”人群的自由时间,因为每一次、对每个个体自由时间的“侵占”都意味着资本完成积累效率提高的可能性。特别是步入现代社会,资本本身不仅仅具有“迎合需求”的能力,而且还具有了“创造需求”与“引导需求”的能力,一方面,资本可以采取虚拟化与信息化的产品与服务,如各类应用程序、网络服务等等,除去生产、研制这类产品的本身的耗费不谈,这类产品本身一经出现,就拥有几乎无限复制的可能,它们占用了人群大量的自由时间。虽然,在这里消费者看似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因为我们可以随意屏蔽、甚至删除,并且每个人只需要支付很小的费用。但是,在这其中交换价值的实现速率确是异常惊人的,在很多时候,甚至我们进入一个网页、点“赞”、加“关注”其交换价值就已然实现。而且,每一个相关的产品也拥有相当多的“替代品”,当然,这种“替代品”的选择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刷屏”。^①另一方面,资本还营造出另一种“假象”,仿佛一向只注重交换价值的资本,如今对每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分外关心,资

①此处所言的“自由时间”主要是指,在除去一个人每天的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可以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可以说是“休闲时间”,而除去行业特点、从业者自身的状况,这一时间其具体的长短有差异,但却普遍存在。

本不断地以“改善生活”等贴近人群的话语,来推出各种新的产品,实现产品升级换代的加速,一件同样的产品往往拥有多个版本。在每次“细化需求”的背后,都需要购买者花费时间与精力去学习与比较,事实上,如今的购买者经常处于一种“学习—使用—再学习”的消费行为中,这一过程的实现有着越发缩短的趋势。

如莫罗阿所言:“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危险未曾来到时先自害怕,先自想象危险的景况”^{[11] 126}。当我们怀揣着“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疑问时,实际上折射出了当代中国人自由时间的“相对紧缺”的问题,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自由时间的充裕是一个绝对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时间,长期处于一个“相对紧缺”的状态,或者说,我们的自由时间,越发被资本的逻辑所统辖,那么,我们大多数人都开始感受到一种自我的迷失的过程与结果,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种生活状态难以称之为“幸福”。拥有越多的自由时间,反而感知到越不自由,这种自由时间的“边际递减”,恐怕是当下“幸福边际递减”的重要原因。“中国体验”的研究,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心态,是人群的心灵体验,在这一维度下,“幸福”只是重要的内容之一,而非全部,但它与其他中国人的体验一样,受制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体验”的后续研究,应该着力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上,在人群的心灵中,完成“描述性要素”的找寻与论述,这是其称之为“体验”而非“经验”的核心所在。也是从一个更为深刻的角度去阐述“中国经验”的出发点。

三、“心智的体验”: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完成中国体验的评价性要素

在“中国体验”研究的“决定性要素”与“描述性要素”之外,还应该注重另一种“评价性要素”的把握。“中国体验”是对社群心态、价值观的研究,这其中必然涉及一个评价机制的问题。在“中国体验”每种具体化的“体验”之后,都往往会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一场关于社会整体价值观和道德的更大范围的讨论,如从早些年的“捞尸索金”与“小悦悦事件”,到“天价大虾”与“旅游黑名单”,再到最近的“共享单车遭黑手”与“明星婚恋纠纷”,这其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中国国民整体的“心智”的发展,或言道德的境域显示出极大的关注度,其讨论涉及的范围越发广泛,并且讨论的平台也越发多元,大多数参与者都可以“直抒胸臆”。当然,对于个体的评价,由于个体发展水平、所处环境的不同,其结果千差万别,在这个层面上来说,难说谁对谁错。然

而“中国体验”所完成的是人群心态的“单点分散”到“多点集合”的研究过程,是带有“最大公约数”性质的社会心态问题,那么对其的评价就是可操作,且十分必要的。我们对于个体的“心智”的进行评价之时,一方面既要从事横向上的与同龄人心智的普遍发展水平相联系,另一方面也要从事纵向上,从个体自身的成长角度出发将“当下”与“过去”相联系。泛化地说一个人心智的“成熟”与“不成熟”都是不可取的。这里所提及的“心智的体验”就意图强调,对于“中国体验”的评价,应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找评价性因素,而跳出以往“好与坏”“善与恶”的简单化认知,既要从事中国人普遍的“心智”发展历程出发,也要从事当代中国人“心智”与社会本身的调试性着手分析。给予一种具体化的“中国体验”以科学的评价。

以前文中国人目前对资本所持有的“怨恨式批评”为例,如果我们立足于个体的心态,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消极的心态,不难想象,一个人如果长期背负着怨恨,其步履只会愈加沉重,从这一点上来说,舍勒将“怨恨式批评”概括为是“自我心灵的毒害”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国人“心智”总的发展历程而言,我们认为,“怨恨式批评”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总体心智发展的重要转向,对于资本采取一种“怨恨式批评”而非一种单纯的“批评”,事实上,是中国人在这世俗生活层面对中国资本历史生存权的承认,它表明了中国人整体心智的进一步发展,逐渐从以往革命话语影响下的极端化的思维,过渡到理性化与合理化的认知与表达;在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这种认知、体验上的变化,是与转型时期社会心理的基本要求相适应的。这一中国人“心智”上的转变或者成熟,实质上揭示了中国人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 20 年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资本的运作成就的肯定。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相当不易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当前资本与社会整体相适应的背景下,资本对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较为突出的是,资本只会从其本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塑造自身所需要的“幸福观”与“时间观”,而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而言,这是与人的本性相背离的。将幸福、时间等直观的体验,与资本本身的特点相联系,凸显出在社会主义中

①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近几年间中国网络销售“井喷式”的发展。特别是自 2009 年“双十一”活动以来,在这场每年一次全民的“网购盛宴”之下,各大网络购物平台的交易额屡创新高。在千亿的交易数字背后,很少有人会关注,事实上,有相当多的人,很早就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精心编辑自己的网络购物车。

国如何认识、运用资本的重要命题。这也是从“中国体验”再次回到“中国经验”的应有之义。在这种多要素、不同层面的审视之后,我们对于中国“资本体验”的何去何从,便能有初步的结果。从人群的认知上来说,我们不能采用以往那种将资本视为绝对的恶的代表,对其唯恐避之不急;我们也反对,将资本视为“天生的共享派”,这只能导致资本对人的异化趋势的漠视;那么我们所“体验”到的只会是一种“迷失的幸福”。而这种“体验”路径的生成,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资本运作的深入研究,是一个属于“中国经验”层面中的问题。

总的而言,“中国体验”的3个要素、即决定性要素、描述性要素、评价性要素,三者都拥有属于各自的论域,同时,在现实中我们选择资本与幸福作为研究的素材,是想以此为例证,尝试说明“中国体验”研究3个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从逻辑关系而言,决定性要素来源于经济社会的运行中,它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体验”的产生以及发展方向。描述性要素来源于“中国体验”自萌发以来的演变历程中,原本单纯产生于经济生活的“体验”与人群的传统习俗、地域环境、生活条件发生碰撞,进而使得“中国体验”产生丰富的种类与形态,甚至形成某种特有的特色。而评价性要素,是指在文明社会中应当给予人类心灵的发展以“一席之地”,而这种心灵的描写或记载应该带有客观的评价。同时评价性要素也是一种“回归”,意旨再次审视我们的现实生活,为现实生活提供发展的相关参照与指标。从学术研究的进入路径而言,“中国体验”的研究,首先面对是人群心态的描述性要素,它最大限度地决定了我们所阐述的“中国体验”是否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否具有代表性的。而当我们在对“幸福”“信任”“时间”等中国人的感受进行研究之时,不应该忽视其背后的决定性要素,即对“中国经验”的考察;而对于“中国体验”应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性要素的寻找与完成,是“中国体验”研究的最后一步,也是在实践中引导、深化这些体验的基础。

四、结 语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称之为“激荡四十年”,那么中国人的价值观、心态

的转变也许更为此起彼伏,这一问题本身就散发着强烈的学术吸引力,也是相关学者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维度。周晓虹先生《中国体验》一书堪称此类研究的“先行者”,有着其固有的学术价值。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体验”的相关研究,当前尚在起步、摸索的阶段,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最为突出的即是对于“中国体验”,或言对于中国人心态的探索,我们应该秉持何种研究方法?这实质上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此,我们根据自身的学术背景,尝试性地提出了对于“中国体验”相关研究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模式,供相关学者与大众批判,以推动“中国体验”的相关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1] 周晓虹.再论中国体验:内涵、特征及研究意义[J].社会学评论,2013(1):1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73.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7.

[6] 马克思·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觉[M].刘小枫,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85.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5.

[9]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36.

[10] 周晓虹.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3.

[11] 安德烈·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M].傅雷,译.上海:三联书店,1985.

[12] 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十七个矛盾[M].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3.

(责任编辑:许宇鹏)